

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 人类社会的由来和发展

聂玉林 著

香港南方人民出版社

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 人类社会的由来和发展

聂玉林 著

香港南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书名/ 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 著： 聂玉林 — —香港： 南方人民出版社
人类社会的由来和发展

2010.8 ISBN962—8735—14—4

I 用…… II 聂…… III 中国 — 当代

书 名：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由来和发展

著 者：聂玉林

出版发行：香港南方人民出版社

地 址：香港湾仔骆克道 173 号

选题策划：中国当代作家协会

本书责编：庄方振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90 千字

印 张：11.2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62—8735—14—4

定 价：港币 20.80 元 人民币 20.80 元

前 言

在卢沟桥“七七”事变的前三个月零二十六天，我出生在内蒙古土左旗，所以我出生后不久就当亡国奴。更悲惨的是在我刚满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聂德俊因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会”而被日寇抓到张家口南察监狱，家境立即陷入饥寒交迫。我五岁时候便负责拉弟弟每天去日本人军管的毛布工厂（即现今呼市中山路维多利亚商场东侧）去等待给日本人做工的母亲回家。两条大洋狗守在工厂门口，日本人雇佣的狗腿子对每个女工做搜身检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饱尝了“亡国奴”的滋味。为了使全家三口人能够活下去，我从六岁开始即捡煤渣、捡树枝、捡菜叶，

过着苦难中的童年生活。四五年“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了，撤走前我目睹了一个日本军官把日本宪兵队的当兵的集合在一个场地上，讲了一通听不懂的话，然后抽出指挥刀愤怒的砍断一棵小榆树，然后带着这些日本兵撤走了。就在日本投降时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并给父亲治好了伤病他便参加了革命队伍，于一九四六年被指派回呼和浩特市了解敌情，我们一家四口才得团圆，我们的家庭生活开始好过些了。父亲当教员，并让我经常偷偷的把学校的刻腊版的钢板和油印机辊子带回家，父亲经常在晚上把窗户用破毯子堵上，在油灯下刻写反蒋传单，然后在呼市的大街小巷张贴。并陆续介绍过近百名青年参加革命，所以我在少年时代即悄悄学会了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直到一九四九年“九一九”和平解放后，我在呼市一中参加了少先队，一九五二年我在部队参加了共青团，在一九六〇年呼市水泥厂工作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我这一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诲下走过来的。共产党是解放穷苦百姓的，共产党是靠马克思列宁主意起家的，所以我很自然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在原绥远省医药公司工作时就开始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后一有钱就买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和其他文史方面的书籍，手不释卷地的坚持学习，从而对马列主义哲学有所领悟。但是，从196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矛头直指苏共的反修斗争之后，我对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唯物论产生了疑问，诸如：既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都是些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既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已经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五十多年的苏联，为什么又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诸如此类的理论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1965年底原呼市工业局机关的“四清”运动进入整党鉴定阶段，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对一些同志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批评意见。当时有位叫赵烈的老同志提醒我：“你给别的同志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好的，但是你提意见时是为了图痛快呢，还是为了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我深深的反思。我不禁回顾起多年来不知不觉中总是容易犯的老毛病，给别的同志提意见总是烟熏火燎地使别人不好接受，其根源究竟在哪里？……在一系列的反思自问之下，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假设我批评的同志是我的亲人，我给他提意见的时候，一定会带着感情带着关切的心情，这样做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突然发现：思想感情不同的背后，其实质仍然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我”字在作怪。于是我的精神世界豁然开朗，就像是蹬开了蛋壳突然看见了星辰日月天地山川大世界的一只小鸡一样，进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对过去所学过的东西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解，诸如：过去认为“觉悟”两字，不过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认可，而这时却认识到是通过实践，经过反复感觉而悟出规律性的道理来；对点煤油灯这件小事，过去根本就没有往深里去想，而现在想来，

如果不把玻璃罩扣上，就必然是既照亮了黑暗，又烟熏火燎地让别人难受；当时正提倡学习“老黄牛”精神，我提不出什么不同意见。而这时就觉得应当把提倡“老黄牛”精神同提倡“牛犊子”精神辩证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引导人们走上思想革命化的正确轨道；当时把“一分为二”提得山响，我在这时却觉得它违背了“对立统一”法则，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形成了事实上的“一切两半”……这些不同的思想认识像金花喷射一样不时闪现。就这样，在学习和重新回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油然而生了想向毛主席述说些什么的想法。于是在1966年2月7日给毛主席写好并发走一封信，汇报了自己整个精神世界变化的经过，并感觉自己已经冲破了“我”字的束缚，由必然王国已飞跃到人类精神领域的自由王国，使自己变成了一只只能看见天地山川大世界的“革命小鸡”。

1966年初，中国又开始了《海瑞罢官》的大辩论，它深深地吸引和激发了我，使我对无尽无休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厌烦和新的疑问：既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什么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这么多年，阶级斗争还没完没了？……当时，《人民日报》刚发表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文，我为焦裕禄一心为民的光辉业绩深深感动。在组织大家学习时，却有一位同事说家里闹矛盾参加不了，为此，我特意去该同志的家里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矛盾。听了老太的述说之后，我做了分析，感到他们家的基本矛盾是老人年轻力壮时全心全意无微不至地围着唯一的儿子媳妇转，所以养成他们比较强的“为我”的习惯；如今老人年纪大了，

需要这唯一的儿子和媳妇照顾老人了，但习惯已经养成的儿子难以适应为老人的客观需要，这就是他们家庭矛盾的基本特点。从这种分析中使我顿悟到“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习惯势力，这两种习惯势力是随“人心是向下亲的”这个血缘渠道，在不同条件下形成的。就从这天起，我开始夜不成寐、脑海里金花四射、思絮不断，从而悟到了正是“人心是向下亲的”这个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却蕴含着最深刻的哲理。正是从“人心是向下亲的”这一点开始，才集结而形成了最初的人类社会，也正是从“人心是向下亲的”这条亘古不变的定律，才使得富有者阶级很容易使自己的子女养成“人人为我”的习惯，使他们养尊处优、变懒、变蠢、变弱，从而必出败家子而使家族变穷；而贫困阶级的子女，由于父母为养家糊口辛勤劳动，没有条件整天围着子女转，很小的时候这些孩子就要帮助父母讨生活，学本领，所以较多的养成“我为人人”的习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需要，求得生存，进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寒门出贵子”的由来。这个“穷则思变，变则或富，富则思乐，乐极生悲，悲则复穷”的历史循环图正是围绕着“人心是向下亲的”这个轴心在不停地运转，使对立的阶级成员不断地转化。

当我悟到这一层的时候，深深感到当时中央提出的“永远不忘阶级斗争”的口号是极端错误的。但由于我已经连续五、六天白天去原呼市工业局上班，夜晚静下来之后脑海里金花四射，无法入眠，思絮不断，已深感精枯力竭，于是，我在66年2月14日赶到旧市委礼堂找到云志安同志陪

我找乌兰夫同志，请内蒙党委领导帮我找毛主席汇报。在云志安同志拒绝后，我便立即赶到原呼市工业局，让打字员打了一首求见毛主席的诗：“七日寄丹书，但望主席收，唯恐多尘阻，不解当粪土”。就向领导请假要去北京赶快向毛主席汇报。这种情况令全局同志都大惑不解，党支部几位老同志都生拉活扯不让我走。直至支部的组织委员答应让我写好材料，党支部负责向毛主席汇报后，我才用2天时间在保密状态下写成了《共产主义由理想发展为科学》的汇报提纲，于1966年2月17日通过机要通信，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正式汇报我的理论发现。汇报提纲开篇第一章的题目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批判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剩余，从而产生私有、私有制，产生剥削和阶级对抗的理论框架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定式，明白揭示了私有制产生的真正根源就在于随人类为防止近亲繁殖引起的种群退化而不断排除血亲通婚，直到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出现而必然形成的历史结果。苏联和中国在消灭了私有制变成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之后，阶级分化、阶级斗争仍然不可遏止的客观事实，就极其明白地告诉人们：正是家庭这个私有制的社会细胞，在不断地产生阶级分化，于是在这个“汇报提纲”里我还提出了要逐步破坏家庭以取代年年月月搞阶级斗争。可是破坏家庭同谭嗣同的《大同书》上的“破九界”中的“破家界”的思想如出一辙。后来我又反复自问：家庭该如何破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这不仅让夫妻关系不能固

定，就连儿女关系也不能确认，这就必将引起人性伦理的紊乱和血缘交混的产生。于是我进一步苦苦思索。

这个汇报提纲寄走后，上面毫无动静，于是我发生了怀疑，可能是这份材料被截留了。为此，我用蜡版刻写了 21 个问题，有人去北京时捎到北京后寄发给当时执政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中央领导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并请下面工作的同志思索一下这些哲学理论问题是否能够回答，如果回答不了，请赶快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这些问题如下：

1、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吗？为什么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革命？

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为什么已经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的苏联和中国仍然自发地出现资本主义倾向？

3、既然要永远不忘阶级斗争，离开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怎么划分阶级？

4、既然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那么，在遥远的尚未产生阶级的古代社会，还有没有民族（种族、氏族）问题呢？

5、如果说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那么无阶级时代的战争做何解释？两次世界大战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战争？

这 21 个问题倒是惊动了中共中央，中央办公厅随之一天一个电话给内蒙呼和浩特市追查我是什么人，什么背景，惹下了塌天大祸。在中共呼市市委李贵书记主持下，我被定为“明目张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而

清除出党，离开工作岗位，监督劳动。随之又被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旋涡，几乎家破人亡。在这里，我特别感激市委李贵书记，他很清楚我的问题严重，但不是坏人。于是，只给定性为“言行”，虽然有言无行，但没有戴帽子，少降了一级，让我还能养家糊口。

196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原呼市市委和工业局来电话，要走一份《共产主义由理想发展为科学》的汇报提纲，这说明这份材料中共中央甚至毛泽东主席本人可能已经看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关峰和戚本禹没有胆量直接要这份材料，应该说是毛主席让他们要的。但是，由于这份材料本身就是批判历史唯物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所以我的命运只能是阶级斗争学说的牺牲品。随着文革运动的开展，已合并为工交委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坚决声讨聂玉林的反革命罪行”，随后就是大小会批斗，追问我与彭、罗、陆、杨的“二月提纲”有什么联系等等，后来便送到糖厂监督劳动，继续隔离审查，还抄了两次家。到67年3月初，两派斗争激烈了，军区门口发生了枪杀韩桐的事件，在顾不上看管我的情况下，我也去军区门口看了一回现场情况，当时保守派不承认军区有人开枪，学生们咬定是军区有人开枪打死韩桐，我当时出于想证明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也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而且理论上确有新发现，于是便写了“评韩桐之死”一文，就贴在民族商场对面原旧市委的临街墙上，当时署名单丁。没料到大字报一贴出，便引来大批抄录大字报的群众，我也当了一回群众纷纷来访的“明星”，原工业局的同志们还专门给腾出一间办公室让我接待来访群

众。不少群众组织拉我入伙，我都婉言谢绝。不久，清理阶级队伍一来，我又成了“三反分子”，甚至抓到“群专”与医学院附院的许多专家教授和李悦等决联站的派头头们同为群众专政的犯人。68年进了“五七”干校，后来又送到石家庄军管的学习班，一直到改革开放，我才又爬起来有了工作。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1980年我平返恢复党籍之后，我的思想又焕发了青春与活力。

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十分活跃，我首先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按照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来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尝试。由于他生逢欧洲工业革命的年代，他从工业革命的巨大发展深深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对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所以，他就认定了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在这里很容易被忽略的是在生产力中被物化的人却仍然应该是历史发展的主角。正因为如此，他关于生产力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才全部落空。其实，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只能是其中之一，至于人本身的作用，就非常重要、非常复杂了：既有人类自身生产方式的伟大改革的推动，也有政治的直接决定作用，还有杰出人物的正确引导（这就是俗语所说的“英雄造时势，时势也可以造英雄”），甚至也可以说天灾人祸也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所以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就发现很多历史事件就是国家政权在决定一切，并不是生产力在决定一切。在这一点上我的研究结论同王沪宁同志的政治决定论不谋而合。因此，在我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之后，我深深感到以物化生产力的发展

来描述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势必漏洞百出，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尽管我在这方面的认识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深了一步，但我的这点成绩是踩在伟人的肩上取得的。尤其是我从53年起，就爱学哲学，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道理，所以，我才能深刻理解“对立统一”规律，才能运用这一光辉思想发现历史唯物论有物本化的倾向，使以人为本的辩证历史唯物论，成为我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有力武器。尽管我在很多地方明确指出伟大导师们的不足之处（这是我面对理论课题无法回避的，因为党一直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讲真话）。但是本人至今还是共产党员，我不能怀着不敬之心来讲述这一切。回想66年2月14日，我所以急急忙忙找毛主席他老人家汇报我的理论发现，就是因为当时在理论成形时已连续五六天未眠，唯恐我有个三长两短就误了国家大事。更担心毛主席他老人家坚定不移地消灭私有制，坚持不懈地搞阶级斗争，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当同志们阻拦我时我急的直哭，难怪当时大家认为我得了精神病。在党内会议上，我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毫不掩饰地直述己见：毛主席年年搞阶级斗争，而且是年年搞“窝里斗”，今年搞它百分之一、二、三，明年再搞它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不停地斗下去，不用30年，共产党的政治基础就差不多都变成阶级敌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有活头吗？恐怕连老婆孩子也保不住。这就证明我是尊敬和热爱毛主席他老人家的。

特别是从小平同志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党中央扶持私有制企业的政策出台以后，我感到压在身上的精神负担解除了，

我也就没有必要再为我的理论思索向世人保密了。就在这段进一步苦苦思索的过程中，我通过电视上的动物世界生存实况的启发，才忽然想到私有观念不仅来源于家庭，而且它的根源还深深地扎在生命的本能上，因为任何生命体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没有这种本能，生命就不可能成长、延续，生物界就会毁灭。当我的认识深化到这个层次的时候，我深深感到消灭私有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还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比较现实可行。同时，我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按照自然历史进程如实地重新描述人类社会由来和发展的历史重任已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于是，我按照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大胆直率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重新审视和认识一遍，认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历史唯物论推进到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阶段。就这样，从2004年到2010年先后五次又向党中央汇报，希望党中央能公开支持，但每次都没有得到回音，也没有受到批评与指责。这就使我感到想让党中央承认并公开发表我的文章可能有许多不便之处，于是，我只有求助于出版社用我的养老备用金自费出版我的著作，其目的无非是想向中国人民从理论上证明党中央关于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群众运动，而实行依法治国的政治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党中央关于发展私有制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的决策是英明的、适时的；党中央实行“一国两制”的决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党中央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千方百计关注民生，要想方设法使老百姓活得更更有尊严，活得更幸福的一切努力都

是前所未有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办好世界的事情的根本方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宣告今后中国再不会出现违背自然规律，违背社会规律的重大失误了。为此，我的这本著述无非是用科学发展观重新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也是实实在在的向世人宣告：共产主义理想虽然不可能是宗教宣扬的天国世界，但它决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线”。

我的这些思想认识由于自认为是更深刻、更全面系统地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重新观察人类社会的由来和发展的初次尝试，所以，免不了有错误和不实之处，希望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更希望广大读者能结合社会生活的历史和现实，指出我的妄言不实之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机关群众组织曾把我用腊版刻写给中央领导机关的二十一个哲学理论问题，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的南墙上，要求群众进行严肃的理论批判。但是，我等了一个月，一份认真批判的大字报都没看到，所看到的只是“狗胆包天”之类的一些谩骂，因此，本书这次正式出版之后，我热切地盼望看到能从理论上认真的批评、批判和指点。党中央胡锦涛主席十分重视哲学研究和理论创新，能有机会以我的这篇小小的著作抛砖引玉地成为推动我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新起点，那么对党的事业，对人类的前途命运，不失为一件好事。学习本来就包含着批判，批判

就意味着创新，而创新就必然引起争论。所以，我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应该说，只有争鸣才是更深刻的学习，这是推动我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途径。

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办好一切事情，给后辈儿孙多留些生存空间，使他们比我们活得更幸福吧！

聂玉林

联系电话：0471-6932911

2010年07月01日

序

聂玉林同志是我相识五十多年的老友。1954年呼和浩特市团委宣传部组建呼市青年业余歌舞团时，我任常务副团长，他是声乐队长。我们每周日集中排练，两人过从较密，相识相知，有共同语言。当时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内蒙古银行通讯》期刊编辑部任责任编辑；他在内蒙古直属工程公司木材加工厂工作。后又先后调入呼和浩特市工业局、交通局工作。历任科员、办公室负责人、科长等职，是中共正式党员。于1997年退休。

聂玉林同志多年给我的印象是：待人诚恳，学习勤奋，原有学历不高，学识水平不低，能力较强，思维敏捷，笔锋锐力，性格刚直，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直言不讳地抨击时弊，甚至敢于向权威挑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他曾公然批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中某